

朱雷教授



朱 雷 教 授

朱雷教授，浙江海盐人。1937年生于上海，现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湖北省史学会理事、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湖北省政协常委、中国

大百科全书隋唐五代史卷副主编。

朱雷教授1955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1959年本科毕业后，考取唐长孺教授的研究生，主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62年研究生毕业，在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从事科研工作。1961年前后，参加唐长孺教授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分册）》的编选工作。在研究室的资料建设方面，他广泛地搜集、摘录了《全唐文》资料卡片、斯坦因文书中有关社会经济资料，并为各类石刻题记进行录文和校勘等，对以后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有利的条件。

1973年秋，朱雷教授开始西行，至洛阳、西安、天水、兰州、敦煌、新疆等地参观考察，初步接触吐鲁番出土文书。1974年秋，赴新疆整理出土文书。1975年秋，正式借调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工作。同年前后，在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教授倡议下，国家文物局组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朱雷教授作为整理组的主要成员之一，远离家乡，克服重重困难，长期工作生活在北京、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与其他同仁一道为这批珍贵文书残简的发掘、整理、缀合、定名、断代、研究等付出了大量心血，协助唐长孺教授完成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全10册，文物出版社已发行8册）的整理、定稿工作。这部著作以它极高的史料价值和高难度的整理、研究作为学术界所震惊，国内外学者纷纷撰文给予肯定和推崇。80年代初，朱雷教授调回武汉大学历史系，继续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工作。

朱雷教授学识渊博，目光敏锐，具有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学方面的深厚功力，同时，也兼通文学、书法、艺术乃至佛教典籍，尤其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典章公文制度有着纯熟的素养。在研究方法上，他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南，并注意继承、汲取优秀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深受近代以来史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唐长孺等前辈学者的影响，善于从具体问题入手，微中见大，旁征博引，融会贯通，透过具体的史料，考察社会结构、典章制度的演变，从沉睡千年的古文书中探索历史时代布满荆棘的史地之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研究风格。他勇于探索，不断进取，在史学领域内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980年，朱教授发表了《吐鲁番出土北凉赞簿考释》一文，深入、细致而全面地研究了吐鲁番所出北凉赞簿文书，解决了其中一些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难题，其观点为国内外学术界广为引用。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教授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篇优秀的研究成果，“将历来被视作麹氏高昌末期的该件文书考定为北凉承平年间的赞簿文书，作者详尽地搜集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有关文书残片，对其用语、性质作了周全的探讨”，并认为

作者对该簿内容的理解也是极深刻的。它的学术价值正如国内知名学者姜伯勤教授所说“正在改变着国内外籍帐研究的面貌”。

1983年,朱雷教授和唐长孺教授一起应邀出席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31届国际亚州、北非人文科学学术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试论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一文,同样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本文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初次发现的6世纪麴氏高昌的私属“作人”,提出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创见,指出高昌私属作人与南朝宋齐的“十夫客”相似,这一重大发现促进了学术界对此一类型中古依附身份奥秘的进一步揭示,其结论为中日学者在有关论著中多处引用。同年,发表了《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估〉考》一文,对本件残纸作出了正确的定名,并据此对唐代的“市”、“作”制度进行了深入考释,被学术界誉为“近年敦煌‘市’‘行’组织研究方面的一篇力作”。

1986—1987年,朱雷教授获美国王安研究院汉学奖助金,完成了30万字的专著《唐代籍帐制度研究》一书的撰写、定稿工作。1986年,在联邦德国汉堡召开的第32届国际亚州、北非人文科学学术会议上摘要发表了《六至七世纪高昌地区的东西贸易》一文。

1987年,以《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与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为研究课题的日本历史学者考察团访问我国之际,朱雷教授撰写了《释道安与襄阳》一文,提出道安法师南投襄阳年代的新证,并收入《中日共同研究报告书》,由日方以汉文出版。同年7月,朱雷教授出席了在香港召开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学术会议,提交了《唐代的计帐与乡帐制度研究》一文,在充分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基础上对唐代乡帐与计帐制度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许多颇具启发性的见解。

1988年,朱雷教授在《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辑)上分别撰写了《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两篇论文,前者首次对吐鲁番墓葬所出唐“点籍样”文书进行了探索,指出“点籍样”的性质应是对“户籍”进行“点籍”之后所作出的定簿,并对“点籍样”制度产生的原因、“点籍样”与“手实”、“户籍”的差异提出了新论,从而填补了唐代籍帐制度研究领域的空白点;后者则通过敦煌所出两种变文写本《燕子赋》中迥异改写及增添描述部分的比对考察,发现唐代对于浮户处置措施的变化诸问题,揭示出武则天括户的时间始于圣历2年,从而对传统的长安2年括户说进行了修正,并探明了唐代浮逃户处置变化的历史过程。这两篇论文同样显示出朱雷教授对于唐代文献典制和吐鲁番文书方面的精深学力。

此外,朱雷教授近年来还分别在《文物》、《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史论丛》、《武汉大学学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敦煌吐鲁番学术论文集》、《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等书刊上先后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有力地推动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进展。他的学术实践和学术活动,在国内外学术界赢得了较高声誉。

除研究工作外,他先后为本系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开设了“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文献学”等课程,深入浅出,悉心讲授,深受好评,并经常深入学生中间,认真辅导,解答各类学术问题,同时,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为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教学改革和教学实践做出了贡献。

目前,他除了承担大量社会工作和教学任务之外,还承担了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唐“格”“式”拾遗》一书的撰写,并孜孜不倦地从事其他科研工作。同时,积极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为繁荣祖国史学、培养新生力量。

(冻国栋)